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效能、 作用梗阻与路径优化

倪海滨

(浙江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00)

[摘要]人工智能正由外在辅助工具转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性变量,推动教育对象识别、内容生产、关系互动、场景建构与评价治理发生深刻变化。既有研究较多论证技术赋能的价值潜能与风险形态,却容易将技术可用性等同于育人有效性,尚未充分揭示技术优势转化为现实效能的内在条件及其阻滞机制。本文立足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属性、主体属性与实践属性,将现实效能界定为人工智能进入真实育人过程后形成的工具增益、关系改善、价值内化与治理优化的综合结果,构建“技术供给—主体转化—场景嵌入—制度规约”的分析框架。研究认为,人工智能能够促进对象识别精准化、内容供给适配化、教育交互协同化、育人空间泛在化和评价反馈过程化,但其效能生成受到技术理性遮蔽价值理性、智能代理弱化主体能动性、算法偏差与模型幻觉、数据规训与隐私风险以及组织制度滞后等多重梗阻。为此,应坚持价值定向、主体主导、可信技术、数据善治和制度协同,形成从技术准入、场景应用到效能评价与风险纠偏的闭环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由“工具赋能”走向“价值赋能”和“育人赋能”。

[关键词]人工智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实效能;作用梗阻;人机协同

[作者简介]倪海滨(1990—),男,江苏新沂人,浙江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讲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现实效能与路径优化”(项目编号:GH2025531)。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308020>

[中图分类号] G64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

一、问题提出:从技术可用转向育人有效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并强调加强数据安全、算法安全和伦理安全。教育部等九部门进一步提出以应用为导向、以治理为基础,推动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教育治理整体性变革。这表明,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关系已经超越单一工具应用,开始进入资源组织、知识生产、主体交往、过程评价和制度治理的深层结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领域,也是技术逻辑、价值逻辑和社会逻辑高度交汇的特殊场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算法推荐、学习者画像与智能问答等技术持续嵌入课堂教学、网络育人、学生管理和咨询服务,为破解对象

差异难识别、内容供需不匹配、教育反馈不及时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

基于此,本文将“现实效能”置于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中心位置,重点回答三个理论问题:人工智能进入真实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后能够形成哪些层次的育人效能;这些效能通过何种结构和机制生成;技术优势在转化过程中受到哪些关键梗阻,又应如何形成与之对应的优化路径。本文所强调的“现实”,不是依赖单一调查数据作经验归纳,而是相对于抽象潜能和技术想象,考察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主体关系和运行环节中的实际作用边界。由此构建“技术供给—主体转化—场景嵌入—制度规约”的分析框架,推动相关研究从“人工智能能做什么”进一步转向“人工智

能如何真正服务于人的发展”。

二、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实效能的理论内涵

(一)人工智能赋能:由功能叠加走向结构重塑

“赋能”不是以技术替代人的活动,而是借助新的资源、能力和组织条件增强主体行动能力。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坚持教育者主导和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将数据感知、模式识别、知识生成、智能交互和预测反馈等能力嵌入教育过程,进而重组教育资源、改造教育流程、拓展教育场景并提升主体能力。它至少包含三层意涵:在工具层面,人工智能提高信息搜集、内容加工和过程反馈效率;在关系层面,技术作为新的中介参与师生互动和知识建构;在结构层面,数据、算法和平台进入教育决策与组织治理,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局部数字化走向生态智能化。已有研究指出,人工智能的作用已经从微观教学模式创新延伸到中观理论机制和宏观教育生态变革,因此不能将其理解为传统方式之外简单增加一种新媒介。

(二)现实效能:由技术效率走向育人价值

本文所称“现实效能”,是人工智能进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真实过程后,在教育目标、主体关系、过程运行和治理秩序中形成的综合性积极结果。它不同于技术潜能:潜能说明人工智能具备何种功能,现实效能则说明这些功能经过教育转化后实际能够实现何种育人价值;它也不同于一般效率:效率主要关注投入产出和任务完成速度,现实效能还必须考察内容是否正确、关系是否改善、价值是否内化以及风险是否可控。由此,现实效能具有复合结构:工具性效能体现为识别、生成和反馈能力的提高;关系性效能体现为师生交往与学生参与方式的优化;价值性效能体现为理论认知、政治认同和行为选择的促进;治理性效能体现为资源协同、过程监督和风险处置能力的增强。四类效能相互联系,但不能相互替代,尤其不能以工具性效能的提升直接证明价值性效能已经实现。

(三)作用梗阻:由一般风险转向效能转化障碍

“作用梗阻”是指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向思想政治教育现实效能转化时,由价值偏差、主体失衡、技术缺陷、数据风险或制度滞后造成的阻塞、衰减与偏移。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风险存在区别:风险强调可能发生的不利后果,作用梗阻则进一步关

注不利因素位于效能生成链条的何处、如何改变赋能方向以及为何使技术投入不能产生预期育人结果。比如,模型幻觉不仅存在内容错误风险,还会破坏教育内容的可信度;数据画像不仅存在隐私风险,还可能以标签替代对人的整体理解;教师依赖智能生成不仅涉及能力退化,也可能使教育责任发生转移。以作用梗阻为分析概念,有助于将风险识别与路径优化连接起来,使治理措施对应具体的效能断点。

(四)分析框架:技术供给、主体转化、场景嵌入与制度规约

人工智能的现实效能并非由技术单向决定,而是在四个环节中逐步生成。技术供给是前提,决定系统能否提供可靠数据、优质内容和有效交互;主体转化是核心,决定教育者能否进行事实核验、价值校准和情感补充,学生能否保持批判思考与自主参与;场景嵌入是载体,决定技术功能是否与课堂教学、日常管理、网络育人和实践教育的具体任务相适配;制度规约是保障,决定技术准入、数据使用、内容审核、责任追溯和效能评价是否形成稳定秩序。四个环节构成连续的转化链:技术性能只有经过主体能动性的教育转换,在適切场景中稳定运行,并受到制度边界约束,才可能转化为真正的育人效能。

三、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效能

(一)对象识别由经验判断走向动态感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长期面对学生数量大、群体差异明显、思想变化隐蔽等难题。人工智能可以整合课程学习、校园活动、网络交互和服务需求等多源信息,对学生群体特征与阶段性需求进行动态识别,使教育者从依赖零散经验转向数据辅助判断。其现实价值不在于建立静态标签,而在于发现传统工作中难以及时察觉的需求变化和风险信号,为分类引导、资源配置与个体关怀提供参考。特别是在学生表达方式日益网络化、圈层化的背景下,语义分析和趋势识别可以帮助教育者理解青年话语、情绪变化和关注议题,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前瞻性。但这种识别只能作为教育判断的辅助证据,必须与面对面交流、现实表现和具体情境相互印证。

(二)内容供给由统一传播走向适配生成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在权威知识资源支持下完成资料检索、案例组合、问题解释和多模态表达,

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单一文本和统一进度转向分层呈现与即时生成。针对不同专业、年级和认知基础,技术可以转换理论表达方式,将宏大理论与学生的学习生活、职业发展和社会热点连接起来,提高内容的可理解性与情境相关性。燕连福、秦浦峰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助于教育者更加系统地认识教育对象,并使教育内容契合个性化与隐性化目标。这种效能的关键并非“千人千面”本身,而是以共同价值目标统摄差异化表达:个性化解决的是进入学生经验世界的方式,主流价值和理论逻辑则构成内容生成不可偏移的底线。

(三)教育互动由单向传递走向人机协同

人工智能的对话能力改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受时间、空间和师资精力约束的状况。学生可以围绕理论疑问、现实困惑和价值冲突进行连续追问,教育者也可借助智能工具设计问题链、模拟争议情境和生成反馈建议,由此形成教师、学生与智能系统共同参与的互动结构。相关研究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推动教育者由显性知识传递者转向价值校准者和过程引导者,学生由被动接受者转向主动交互者。现实效能由此体现为互动机会增加、问题暴露提前和学习参与增强。但人机协同不能演变为机器主导:人工智能可以承担重复性解释和信息辅助的职责,教师仍须负责政治方向、复杂判断、情感沟通和最终责任,以人的教育活动统摄机器的计算活动。

(四)育人场景由固定空间走向虚实泛在

人工智能与虚拟仿真、数字人、知识图谱和移动平台结合,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固定课堂延展到网络空间、学生社区、社会实践和日常服务。场景化的意义在于将理论内容嵌入具体问题与行动情境,使学生在选择、判断和互动中理解价值原则。程琼、刘宏达从课程育人、网络育人、实践育人和文化育人等维度讨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场景建构;孟飞等人进一步概括出多元主体共构、动态生成、虚实泛在和过程追踪的新范式特征。对于高校而言,虚实融合能够贯通课堂主渠道与日常微循环,但场景拓展不是简单增加沉浸体验,而应避免技术景观遮蔽理论深度,防止学生停留于感官新奇而未能形成价值理解。

(五)评价治理由结果判断走向过程反馈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往往依赖课程成绩、活

动次数和阶段总结,难以呈现价值认知形成的复杂过程。人工智能可以对学习参与、问题类型、资源使用和互动反馈进行持续分析,为教育者提供过程性证据,促进评价由事后结论走向动态诊断。其治理效能还表现为跨部门信息协同、教育资源调度和异常情况提示,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更及时地配置支持力量。需要强调的是,价值认同不能被简化为可计算指标,数据只能呈现人的部分外显行为。评价的合理方向不是用算法给学生作固定结论,而是以数据发现问题、以教育对话解释问题、以实践观察验证问题,形成“数据辅助—主体研判—教育干预—持续反馈”的工作闭环。

四、现实效能生成的内在机理

(一)数据感知实现教育信息的重新组织

人工智能首先通过数据化将分散于课程、平台和活动中的教育信息转化为可识别、可关联的对象。数据感知能够突破教育者个体经验与有限注意力的约束,呈现群体趋势、个体差异和过程变化,为精准教育提供信息基础。但数据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平台规则、采集范围和指标设定过滤后的现实表征。数据感知能否产生效能,取决于数据是否真实、完整、必要,以及教育者能否理解数据背后的生活情境。只有将数据作为理解人的入口,而不是代替人的结论,信息重组才会转化为教育认知能力。

(二)算法适配推动资源与需求的动态匹配

算法通过分类、关联、推荐和生成,将教育资源与学生需求进行动态连接。其作用机理表现为:从学生问题中识别主题,从知识资源中组织解释,从互动反馈中调整表达,使教育内容具有更强的时效性与适配性。信息系统成功理论表明,系统质量和信息质量是技术收益形成的重要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算法适配还必须接受价值目标的约束,因为“最符合兴趣”不等于“最有利成长”,“最容易接受”也不等于“最应当接受”。算法只有在公共价值、教育规律和学生发展需要共同限定下运行,才能避免个性化推荐滑向迎合化供给。

(三)人机协同完成技术能力的教育转化

人机协同是现实效能生成的关键中介。自动化研究指出,技术绩效取决于自动化类型、程度与人的监督、判断和任务责任是否匹配。人工智能提供计算能力和生成能力,教育者提供价值判断、情

感理解和情境智慧,学生则通过主动提问、批判反思和实践行动完成意义建构。三者并非地位对等的主体:人工智能属于教育介体,其作用必须由教育目的规定。有效的人机协同表现为机器输出可追溯、教师判断可介入、学生选择可自主、教育责任可确认。只有保持“机器辅助而不替代、教师主导而不包办、学生自主而不放任”的关系,技术能力才能转化为人的成长能力。

(四)制度规约保障技术运行的价值边界

人工智能赋能不是个别教师和学生的私人使用行为,而是涉及平台选择、数据调用、内容传播和教育责任的组织行动。制度规约通过明确技术准入、数据权限、人工复核、伦理审查和责任追溯,将分散的技术应用纳入高校育人体系。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风险发生后的纠正,更在于事前规定哪些数据可以采集、哪些任务可以交由模型处理、哪些内容必须人工确认,以及出现错误时由谁负责。稳定的制度环境还能够降低教师因责任不清而不敢使用、因培训不足而不会使用以及因评价失当而形式化使用的问题,使人工智能应用从零散试点转向可持续的组织能力。

五、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梗阻

(一)价值梗阻: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遮蔽

人工智能以效率、预测和可计算性为基本优势,而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人的意义世界、价值选择和全面发展。当技术指标成为评价教育成效的主要尺度时,容易把平台活跃度、内容点击率和任务完成率等同于价值认同,把学生对机器回答的接受等同于对理论的理解。由此,教育目标可能由“培养什么人”偏移为“如何提高响应率”,复杂的思想过程被压缩为可视化数据,价值理性受到工具理性的遮蔽。技术理性本身并非负面因素,问题在于它越出工具边界并反向规定育人目标。现实效能的首要梗阻,正是技术效率与教育价值之间缺少稳定的转换尺度。

(二)主体梗阻:智能代理对人的能动性的消解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代替师生完成资料搜集、文本写作和问题回答,也可能诱发认知外包与责任外包。学生若将模型输出视为标准答案,可能减少独立求证、价值辨析和实践体验;教师若过度依赖自动生成教案、话语和评价,可能弱化理论钻研、学情理解与人格示范。燕连福、秦浦峰指出,过度倚

重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原则、求实原则和示范原则。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不仅来自信息正确,更来自教育者的信仰、品格和真实交往。智能代理越“像人”,越容易掩盖其没有价值责任和生命经验的事实,使师生把教育关系误解为信息服务关系。

(三)技术梗阻:模型幻觉、算法偏见与情感模拟

大模型依据概率生成内容,其流畅表达并不等于事实准确。训练数据中的错误、偏见和价值冲突可能在生成过程中被重新组合,算法黑箱又使使用者难以理解结果来源。对于具有政治性和价值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一处事实错误或价值偏移都可能削弱教育公信力。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能够模拟同理回应,却不具有真实情感、道德承诺和责任承担能力。马也、李轶等研究均指出,技术缺陷可能引发价值偏见、主体弱化和情感互动缺位。如果以拟人化交互替代真实关怀,学生获得的可能是即时安慰而非深层理解,技术便利反而会导致教育关系的空心化。

(四)数据梗阻:精准画像向标签规训的滑移

数据是智能思政运行的基础,也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学生思想、情绪和行为具有情境性、变化性与不可完全量化性,若平台依据有限数据建立固定画像,容易把概率判断转化为身份判断,将一次表达、一个兴趣或一段低谷固化为长期标签。数据收集范围过大、用途不透明和跨部门调用失控,还会侵蚀学生对学校的信任,使其通过策略性表达规避监测,从而降低数据真实性。个性化推荐若持续强化既有偏好,也可能形成信息茧房,使学生在看似自由选择中被算法限定。精准教育必须以尊重人的开放性为前提,否则“看见学生”会滑向“计算学生”和“规训学生”。

(五)机制梗阻:组织制度滞后于技术迭代

人工智能迭代速度快,而高校制度建设往往以传统信息化项目为对象,容易出现管理规则与技术实际脱节。一些高校重平台采购、轻场景论证,重功能上线、轻持续评价,缺少思想政治教育专用的技术准入标准、内容审核流程、数据分类制度和责任追溯机制。不同部门各自建设系统,又可能形成数据孤岛和重复采集。教师培训若只强调工具操作,就不能提升模型辨识、伦理判断和教育转化能力,也难以形成真实效能。机制滞后使技术应用呈

现两种极端:或者因风险顾虑停留于低水平使用,或者在规则缺位时无边界扩张。

六、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优化

(一)以价值定向校准技术赋能的目标尺度

路径优化首先要回答技术为何而用。高校应把立德树人、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公平作为人工智能应用的首要尺度,建立“育人价值优先于技术效率”的评价原则。任何智能工具进入思政教育场景,都应说明其解决的真实教育问题、可能改善的育人环节以及不能替代的人工责任。平台评价不应只考察响应速度、内容数量和活跃程度,还要关注理论准确性、价值一致性、学生主体参与、师生关系改善和实践转化。对于无法证明育人必要性、仅以技术新颖性制造场景的应用,应审慎进入。通过价值目标前置,防止技术逻辑反向定义教育目标。

(二)以主体赋能重建教育者主导和学生自主

思政工作者的人工智能素养应从“会使用工具”升级为“能够教育性地使用工具”。基础层面掌握模型原理、提示设计和事实核验,进阶层面能够进行场景设计、内容重构和数据解释,治理层面能够识别算法偏见、伦理风险与责任边界。教师要将人工智能输出转化为教育问题、对话资源和批判材料,而不是直接交付给学生。对大学生则应强化人工智能素养与价值辨析教育,培养信息溯源、交叉验证、独立写作和负责任使用能力。技术使用过程中要保留学生的选择权、解释权和纠错权,使人工智能成为激发思考的支架,而不是替代思考的答案机器。

(三)以可信技术构筑内容安全与结果核验体系

高校应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需求建设权威知识库和可追溯内容体系,将党的创新理论、政策文本、课程教材、优秀案例和校本资源纳入规范化知识底座,通过检索增强生成、来源标注和版本管理降低模型幻觉。政治性、价值性和敏感性内容必须设置人工复核,不得将通用大模型输出直接用于学生评价、风险认定和教育处分。平台应具备错误反馈、内容纠正和日志审计功能,并定期开展偏见测试和安全评估。不同场景实施分级技术方案:课堂教学侧重理论解释和问题对话,日常思政侧重资源辅助与需求发现,风险事项则坚持人工决策和

多方会商。

(四)以数据善治守住精准育人的伦理边界

数据治理应坚持目的限定、最小必要、知情透明和动态授权。高校需要明确不同场景的数据清单、使用目的、访问权限、保存期限和退出机制,禁止以“可能有用”为由无限采集。学生画像应被视为动态、概率性的辅助信息,不得成为固化评价和标签化管理的依据;涉及思想、情绪和关系网络的敏感数据,应采用更高等级的授权、脱敏和审计要求。学生应有权了解数据为何被采集、如何影响系统推荐,并能够申请更正和删除。跨部门数据协同必须以明确教育任务为前提,通过审批和留痕实现可追溯,避免数据共享异化为无边界监测。

(五)以制度协同形成全流程闭环治理

高校党委应统筹马克思主义学院、宣传、学工、教务、信息化和网络安全等部门,建立覆盖技术准入、场景论证、内容审核、数据保护、伦理评估、责任追溯和效能评价的治理体系。技术上线前进行必要性、价值风险与数据保护评估;运行中监测内容质量、使用边界和异常事件;运行后从工具增益、关系改善、价值促进和风险控制等方面评价现实效能,并依据评价结果调整或退出。责任机制要明确开发者、平台方、学校管理部门和教育者的不同责任,尤其不能以“算法自动生成”为由消解人的最终责任。通过定期培训、案例复盘、风险报告和跨部门会商,使制度成为技术迭代的动态调节机制。

上述五条路径不是并列措施,而是针对效能生成链条的系统修复:价值定向解决“为何赋能”,主体赋能解决“由谁转化”,可信技术解决“提供什么”,数据善治解决“依据何种信息”,制度协同解决“如何持续运行”。只有将五者贯通,才能形成“价值目标—技术准入—主体应用—场景反馈—效能评价—风险纠偏”的闭环,使人工智能应用由项目化、展示性和碎片化实践转向稳定的育人能力。

七、结语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问题,不是技术能否进入,而是技术进入之后能否服务于人的成长、维护教育关系并实现价值引领。现实效能不是人工智能功能的简单总和,而是技术供给经过主体转化、场景嵌入和制度规约后形成的综合育人结果。其积极作用表现为对象识别、内容供给、互动方式、育人场景和评价治理的优化,但这些作

用始终受到价值、主体、技术、数据和机制多重条件的制约。由此,智能思政建设不能沿着“技术越先进、效能越显著”的线性逻辑展开,而应把技术理性置于价值理性的规范之下,把人工智能置于教育介体的位置,把教育者和学生的主体性置于育人过程的中心。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国务院.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Z]. 2025-1-19.
- [2]教育部等九部门. 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Z]. 2025-4-15.
- [3]陈秉公,陈卓. 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逻辑、路径与风险防控[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3):110-117.
- [4]吴满意,杨增崇. 智能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进路[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5):124-129.
- [5]燕连福,秦浦峰.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与对策[J]. 广西社会科学,2023(9):201-206.
- [6]刘箫锋,张锦霖. 生成式人工智能冲击高校思政教育的三维探赜[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12):66-75.

Real-world Effectiveness, Bottleneck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AI-enabl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NI Hai-bin

(School of Nursing,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00,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evolving from an external auxiliary tool into a structural variabl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PE) in universities, reshaping learner identification, content production, educational interaction,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evaluation governance. Existing studies have extensively discussed the potential benefits and risks of AI, but they often equate technological usability with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have not sufficiently explained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are converted into real educational outcomes. Grounded in the value-oriented, subject-centered, and practical nature of IPE, this paper defines real-world effectiveness as the integrated outcome of instrumental gains, relational improvement, value intern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optimization after AI is embedded in authentic educational processes. It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echnological provision—subjective transformation—contextual embedding—institutional regulation”. AI can enhance precise learner identification, adaptive content provision,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ubiquitous educational spaces, and process-oriented evaluation. However, these benefits are constrained by the dominance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over value rationality, the weakening of human agency by intelligent agents, algorithmic bias and model hallucination, data-driven discipline and privacy risks, and lagg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ccordingly, universities should establish a closed-loop governance system based on value orientation, human leadership, trustworthy technology, responsible data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Such a system should cover technology access, contextual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and risk correction, thereby moving AI-enabled IPE from instrumental empowerment toward value empowerment and genuine educational empowerment.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real-world effectiveness; bottlenecks; human-AI collaboration